

# 對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觀察

● 蔣永敬 (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)

## 民權·軍權·黨權問題

中國近代革命運動，主要是指孫中山先生時代及其後來的國民革命。所涵蓋的時間從辛亥革命而至民國以後的討袁、護法、北伐、訓政各時期。兼論大陸中共所面臨的情勢。在上述革命的過程中，常常發生「三權」問題，即民權、軍權（兵權）、黨權問題。此三者之在革命運作時，可稱為民力、兵力、黨力。而其運作的結果，則常產生民治、兵治、黨治等不同的政治局面。此三種政局，在一般的價值觀念中，當以民治（民主政治）為最理想，黨治次之，而兵治（軍人政治）更次之。今日中華民國台灣屬於民治，而大陸中共政權，則屬於黨治（共黨統治），近來又似乎走向兵治。

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結局，何以產生民治、兵治或黨治等不同的政局？就本人的觀察，常因為在革命進行的時期，由於對民權、軍權、黨權所運作的程度不同，而致產生不同的結局。如革命進行之際，軍權過重，即將產生兵治；如黨權過重，即將產生黨治。如以民權為重，亦或不致形成兵治或黨治的政局。辛亥革命的結果，

雖曾出現民治，但不久即轉為兵治（軍人政治）；北伐時期，由於黨權分裂（西山會議、寧漢分裂，特別委員會之不正當），軍權高漲，結果亦產生兵治。中國國民黨為打破此種兵治的局面，乃推行訓政，代以黨治，結果召致軍權的反抗，致有民國十八、九年之內戰。同時亦受到自由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批評。例如胡適之先生在民國十八年所發表的「人權與約法」及「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」等文，可以代表民權對黨權的反對。

## 軍權民權的衝突和調適

依照孫中山先生所設計的革命程序，是由軍治而黨治，最後而達民治，即是由軍政時期而至訓政時期，最後而到憲政時期。在同盟會的革命方略中，稱為軍法、約法、憲法三治。軍法之治，純以武力，掃除革命障礙。如辛亥武昌起義以後，各地均立軍政府，其首領稱都督，甚或稱大都督，行軍事治理。忽視黨權，所謂「革命軍起，革命黨消」之說，盛行一時。軍權既無黨權的指導和約束，而其革命的理想——在爭民權，也為軍權所抑制。因此，民國初創之時，國會與政

黨政治之失敗，代以袁世凱的軍事獨裁與軍閥之專權，論者多認為是由於民初政黨之不健全，政黨無力之故；而政黨之所以不健全及無力量，乃是政黨沒有羣衆基礎沒有民意為後盾之故。所以只有軍權，而無黨權與民權。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，辛亥革命未能達成民治，即是由於約法未能實行之故。

依據同盟會的「民報」中所述孫中山先生的「約法之精義」，指出約法的作用，不僅為推行地方自治，以立民治的基礎，且有防止軍權的擴張，以免民權遭受抑制的作用。其要義是說：革命的目的，在爭取民權；但其結果，未必能如所期。原因是在革命進行之際，必重兵權，此與民權常有抵觸。如抑兵權，則使革命力量脆弱而不能成事；如抑民權而縱兵權，正是軍政府所優為者。如此宰割一切，無所掣肘，於軍事甚便。如此一來，民權為所抑制，不可復伸，迨革命成功，要軍政府解除兵權，以讓民權，不可能之事也。如何使軍權與民權相成而不相尅，其關鍵所在，即為革命進行之際，先定軍權與民權之關係，定此關係，即為約法。因革命之始，必設立軍政府，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，復秉政府（即起義



後之軍都督兼民政長），譬如既定甲縣，軍政府即與該縣人民相約，凡軍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，悉規定之，如軍政府有權發佈命令，組織地方行政機關，派遣官吏；人民有權組織地方議會，監督軍政府是否遵守約法。他日既定乙縣，則與甲縣相聯，共守約法；復定丙縣，則甲、乙縣又與丙縣相聯，共守約法，推之各省均如此。國民如果違背約法，軍政府可以強制之；軍政府如違約法，國民可聯合各地，不履行其義務，不承認軍政府之權利。因為此時革命未定，軍政府與國民之間，利害與共，相需迫切，雖至愚者，不致自相戕害。到了革命成功，全國底定，各省、縣以民意為後盾，軍政府雖欲專權，亦無能為力了。而國民在約法自治的磨練下，已養成自治的能力。此時再由約法而進至憲法，民權立憲政體，得以鞏固而無動搖之慮了。

約法之治只講軍權與民權的關係，但其缺點，即是兩者之間缺乏一個平衡的力量。所以兩者相處，只有相尅，而難相成。而且是軍權壓制民權，即所謂「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講不清」也。這中間所需的平衡力量，就是黨權了。所以民二年間，民黨為袁世凱的兵黨打敗以後，孫中山先生成立中華革命黨，堅決的加強黨權，來和袁氏的兵權相搏鬥。借以兵力、民力不足，中華革命黨的黨權，仍是強不起來。

中國政治的爭衡，兵力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尤其自民國以後，國會兩度遭到解散，民權一再受到壓制，皆因秉政者徒知以武力相雄長；國人又懼於武力的脅迫，未能盡其維護民治之責

，以致民權不強，政黨不良。然武力角逐，其自身亦難持久；縱然大有力者興起，以強併弱，以大吃小，剪除異己，恃其威力，以槍炮為法律，其極也必至民情沸騰，為人民所共棄，陷於窮窮力絀之境。袁世凱及其繼起軍閥的敗亡，可為殷鑑。故知有兵而無民，兵亦不能自存。

依恃兵力以爭衡，雖有嚴重的不良後果，但國民黨在民初反專制反軍閥的奮鬥中，仍以兵力為主。正如孫中山先生後來所檢討的，認為兵力勝利，國民黨隨之勝利；兵力失敗，國民黨亦隨之失敗。因此，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，決定改變方法，除兵力外，要以黨力為主，所謂黨力，即是人民之心力；即是爭取民心，結合民力，使國民黨成為國民的黨。

## 兵力、黨力、民力的結合

由於革命經驗的累積，孫中山先生對其革命方略的規劃，亦大有改進。其最後一次的規劃，則為民國十三年所制定的「國民政府建國大綱」。尤其值得注意的，則為軍政時期的工作，已有顯著的改進。過去的軍法之制或軍政時期，僅以武力來掃除障礙，而「建國大綱」中的軍政時期的工作，除了仍以武力來掃除國內之障礙外，更重要的而要用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，即是「攻心為上，攻城次之」；「得其民者，得其心也」。此為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時引用古人的話來對注重宣傳的說明。再加以武力工作，便是兵力、黨力、民力三結合的奮鬥方式。此對北伐時期及其以後軍權、黨權、民權的演變，有極為

密切的關係。

在國民黨改組以前，黨權不振，黨無力量，護法時期（民國六——十二年），以維護民權的約法為號召，以國會議員和西南軍人為護法的力量。但代表民權的國會議員初與西南軍人相勾結，改組軍政府，迫使孫中山先生離開廣州護法基地；後來這批議員的多數又受軍閥曹錕的賄賂，背離護法，使民權跌落到谷底。而西南護法的軍人，初有桂系的專橫，繼有陳炯明的叛變，其後又有滇、桂軍的跋扈，此實為軍權的擴張達於頂點。此兩大革命力量——軍權、民權，可說完全落空，因此，唯有提高黨權，強化黨力，結合民力，制服軍權。此為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的原因。特舉廖仲愷對改組國民黨原因的說明大要如下：

「此次之所以改組者，本有極大的原因，即廣州政治三次起伏及失敗，皆因軍人持權，黨員無力，故黨之主張無力。假使廣州有相當數目（十萬）之黨員，何致得歷次失敗之結果！黨員本在民衆之內，果有多數黨員，庶足制服軍隊。因為徒恃軍隊，必至為兵所制，不能制兵也。做事須有力量，一方面依賴兵力；另一方面須有制服軍隊之力量，即黨是也。吾黨目前除少數幹部外，並無黨員；雖有力量，然不過一部奮鬥之歷史而已；此種力量固可能罷於一時，但日久必窮倒。改造吾黨，須從下層做工夫；因靠上層，必致如廣州今日（民十二年）情形，徒賴軍隊，不過終為軍隊所用而已。連能改造國家哉！



改組後的國民黨，爲了結合民力，所以在其黨的各級機構中，有宣傳、農民、工人、青年、婦女等部門的設立，來組織和推動各類羣衆運動。同時也強化革命武力，建立黨軍。使得改組後的國民黨，以兵力、黨力和民力來掃除軍閥，確實發揮了極大的效果。在出師北伐以後，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即由廣東進至長江流域，甚至西北和華北的廣大地區，亦多歸向國民政府。僅僅兩年半的時間，反抗國民政府到最後的東北軍，也改變了旗幟，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。這一快速功效，如解釋爲是由於兵力、黨力、民力三結合奮鬥的結果，似乎可以成立。

## 北伐後的「三權」問題

北伐完成以後，中國出現的政治局面爲何？是兵治？是黨治？還是民治？依照「建國大綱」的規定，應該結束軍政，實施訓政；而訓政則一般解釋爲黨治。這中間頗有爭論之處。

如細讀「建國大綱」的訓政工作，實在是充滿民治的色彩。它規定該時期工作是：政府派合格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地方自治，其程度要使全縣人口調查清楚，土地測量完竣，警衛辦理妥善，道路修築完成，人民受四權使用之訓練，舉行國民宣誓者，得選舉縣官、議員。自治之縣，始告完成。再選舉國民代表一人，組織國民代表會，參預中央政事。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自治者，則爲憲政開始時期，國民代表得選舉省長。中央設立五院，試行五權。

依孫中山先生之評價，尙能依建國大綱以行

，則軍政時代已能肅清反側，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治。雖無憲政之名，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，已非假借憲法而行專政者可同日而語。

但北伐時期及其以後的實際情況，並非爲「建國大綱」所期者。在北伐時期，黨權分裂；民衆運動亦爲共派所操縱，走向反民治的行徑。此對北伐後黨權與民權之不振，有極大之影響，形成軍權一枝獨秀的情勢。因此，北伐時期及其以後的軍人，不但治軍，而且治黨和治民，且各成獨立系統，形成軍人分治之局。爲了遷就現實，便有分治理論的產生；爲了打破現實，便有黨治理論的產生。前者以李石曾爲代表，後者以胡漢民爲代表。後者主張，獲得蔣中正先生的贊同，黨治的訓政取得勝利，但地方仍是軍權分治。故黨治的訓政，只能由上而下，而與「建國大綱」由下而上富有民治色彩的訓政，頗有差別。這是由於北伐的形勢所造成。黨治訓政的推行，已極艱苦，已召致十八、九年地方軍權的反抗。如果依照「建國大綱」推行民治的訓政，其困難則可能更倍之。胡漢民——黨治訓政的設計者，曾論

北伐後的政局，認爲只有兵治，沒有黨治，更非民治了。

## 中國大陸最大不幸

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中，其初的考慮，深知民權與軍權的消長關係，故有約法之治，期能兩者併進而不相尅；由於討袁、護法的經驗，遭遇民權沒落，軍權擴張。故改組國民黨，提高黨權，爭取民心，使兵力、黨力、民力三者密切結合，以完成軍政時期的工作。繼之由下而上的富有民治色彩的訓政工作，使憲政時期的完全民治，有水到渠成之勢。其間雖經多年的挫折，但今日中華民國台灣能够進入民主憲政時代，正是遵循孫中山先生所設計的目標而進步的結果。

今日大陸中共政權，一向以人民爲標榜，實際則是以黨專政，不顧民權，由惡化而至腐化，引起民權的抗爭，竟以軍權來壓制，不恤民命，實行屠殺，不僅扼殺民權，其黨權亦將退化爲軍權之黨。如由黨治而退化爲兵治，真是中國最大的不幸了。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史學家蔣永敬教授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。蔣教授所撰「對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觀察」，是一篇最客觀、最深入、不加任何渲染的評論文章，值得細讀。

△周谷先生的「魯迅新傳（三）」因增訂內容，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刊登。敬請讀者原諒。  
△大陸學人顧潮、褚律元，旅美作家陳杰、許正直教授等的作品自下期起將在本誌隆重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